

紅樓夢研究集刊



红楼梦研究集刊

第八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古籍出版社

红楼梦研究集刊

第 八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62,000

1982 年 5 月第 1 版 198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500

统一书号: 10186·326 定价: (六)1.45 元

目 次

文学传统与《红楼梦》的诞生·····	王 勉 (1)
形象的丰满和批评的贫困	
——关于薛宝钗这一典型及其评论·····	吕启祥 (23)
略论林黛玉的美·····	白 盾 (41)
象外之旨,意外之趣	
——秦可卿艺术形象塑造质疑·····	李厚基 (53)
“旧红学”中的典型论	
——红学史一瞥·····	段启明 (71)
论怡红院总一园之首·····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宋 淇 (77)
胸中意匠巧经营	
——论《红楼梦》结构艺术的创新·····	胡小伟 (99)
《红楼梦》中预示的艺术·····	傅继馥 (127)
论《红楼梦》的白描艺术·····	严居强 (143)
说梦录·····	舒 芜 (159)
惜墨如金	
——论《红楼梦》语言的简洁美·····	周中明 (177)
人物的口吻	
——《红楼梦》艺术笔法琐谈·····	王向峰 (197)
从《林四娘》、《婉孌词》到《婉孌封》·····	徐扶明 (205)
《红楼梦》说书考·····	陈毓黑 (219)

- 明义的《题红楼梦》绝句……………杨光汉(233)
明义《题红楼梦》试析……………周林生(241)

- 谈《风月宝鉴》的作者……………段熙仲 潘君昭(259)
《红楼梦》六十四、六十七回真伪问题探源……………魏 谭(265)
谈有正戚序本《石头记》的批语……………正苍山(277)
关于鉴堂……………李 昕(305)

槐园闻雁西园曲

- 曹雪芹在北京史实随笔之一……………徐恭时(309)
曹雪芹与尹继善、傅恒交游考……………宋谋瑛(331)

- 《红楼梦》小考(七)……………陈 诏(361)

《红楼梦》岁时志

- 兼论《瓶湖懋斋记盛》及其他……………郭若愚(375)
《红楼梦》与舶来品……………王利器、王贞平、潘以红(409)
红楼饮谈……………陶文台(421)
《红楼梦》的医药描写……………张曼诚(431)

介绍一部美国的红学专著

- 《〈红楼梦〉中虚构的面具》……………尹慧珉(435)
报刊文章篇目索引(1980年下半年)……………廖 梓(447)

- 谁为红楼作郑笺……………徐 康(22)
磨月抹骨牌……………瞻 詹(39)
五鬼闹钟馗……………徐 徐(40)
“玉堂金马”和“紫府”……………朱松山(70)
“九连环”……………石 鱼(76)

萧红与《红楼梦》·····	梅 尊 (98)
明义与晋昌·····	余师今 (158)
美国两部学术著作中的《红楼梦》论文·····	鲍 蹈 (176)
错简乎·····	朱淡文 (203)
“回回写药方”·····	李梦生 (204)
铁岭, 与曹家籍贯问题·····	邬 水 (232)
子章是曹宜吗? ·····	蒋维钺 (257)
“发其”非人名·····	马 驷 (258)
庚辰本在台北·····	梁 溪 (276)
《红楼梦》书录掇逸之二·····	春 江 (330)
“冰弦”、“灵兔捣药”和“霜娥”·····	朱松山 (374)
《红楼梦》书录掇逸之一·····	春 江 (420)
“鸡皮汤”释·····	惹 人 (460)
编后记·····	(461)

文学传统与《红楼梦》的诞生

王 勉

《红楼梦》是产生在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我们要了解产生《红楼梦》的历史和文学的背景，如果仅仅从中国古典小说发展这一过程来看，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至少要追溯到比十八世纪中叶更早的时期，这样才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在《红楼梦》的主题形成过程中，历史和传统对它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红楼梦》主题中所包涵的民主思想的精萃，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确实几乎是没有什么先例的，但也决不是从天而降的。实际上，它已经长期地孕育和滋长在早先的哲学和文学的思潮中。在明代万历年间，大约相等于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文学上有过一次反复古的斗争；接着从十七世纪中到十八世纪初，在清代又有一次以反对理学为中心的思想运动；处于这两次运动中，明清两代的八股文，又是代表着对政治、社会和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势力。所有这些思潮的演变和发展，都对《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是《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先导。

但是《红楼梦》又是一部跟正统文学完全异趣的古典白话长篇，对于它的主题的形成和艺术构思有着较诸前者更为直接的另外一些因素。在这方面，我们大体上可以沿着两条线索来探讨：一条是从《西厢记》、《牡丹亭》到《红楼梦》，另一条是从《水浒传》、《金瓶梅》到《红楼梦》，这两方面因素对于《红楼梦》的产生有着如血缘一样的重要关系。把这一关系阐述清楚了，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那个总的历史和传统的背景，我们可以说我们所阐释的大体上是

接近于文学发展的情况了。毫无疑问,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思想,在这同时,作家自己又受着历史和传统的制约。只不过在一些具体细节里,我们很难准确无误地知道一个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他的前人,或者一部作品的全部思想渊源所在。幸运的是,作品本身最有说服力,这是使我们通向作者心灵的最好途径。

曹雪芹,他是生活在时代的气息当中的,对于他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当他从事着这一伟大创作时,他正是站在传统和时代的交叉点上。对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一个作家所受前人影响的问题,歌德曾经依照他自己的经历说过这样的意见,他说一个作家更重要的要具有爱真理的心灵,而且不论哪里,当心灵发现了真理,它就能接受。(《歌德谈话录》“歌德的文化来源”)我们说曹雪芹也正是这样,因为他那颗炽热的心,从生活获得的感受,比起历史和传统所给予他的,要丰富得多了。这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真正原因。

一、公安派的反摹拟剿袭和曹雪芹的创作思想

明代文学,除了它的开国和早期一段时间以外,曾经两次受到复古主义思潮的统治。第一次开始在弘治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主的所谓前七子的复古;到了嘉靖中,又有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后七子的第二次复古。这两次复古,在时间上虽然相隔几十年,但前后七子的主张基本上是相同的。当然它们的产生又有各自不同的背景,但他们都企图从学习古人入手,改变诗歌创作的方法,从而转移文坛的风气。在前后七子之间,对于如何学习古人,理解也不相同。何景明和李梦阳在这个问题上有争执,而王世贞的主张到他晚年也有改变。不过他们都把学习古人在时代上作了机械的划分,即所谓文准秦汉,诗准盛唐,唐以后书不读。这样一种机械盲目的学古,其首先导致的恶果就是文学的生机受到扼杀,创作

上剿袭摹拟的风气随之而兴。在这复古倒退的潮流中，以袁宏道（中郎）为首的公安派的反复古运动就应运而起。公安派提出了鲜明的文学主张：反对摹拟剿袭，倡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一反复古运动延续到清初就结束了。饶有趣味的是，在《红楼梦》里，我们看到了这个主张被曹雪芹以大体上相同的内容提了出来。应该说曹雪芹的主张和公安派之间并不存在有任何渊源关系，但这两种主张的相似正反映了从十六世纪末开始到十七世纪初的这一文学运动还在继续发生影响。

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对于复古思潮产生的原因以及它所造成的后果做这样的解释：

……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浓，而浓实因于淡。然其弊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近代文人始为复古之说以胜之。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拙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吁，诗至此，抑可羞哉！夫即诗而文之为弊，盖可知矣。（《袁中郎文钞》）

袁宏道具有文学发展的观点，他认为复古是为了救弊，这一点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以“剿袭为复古”，专门从字、句上模仿古人，这就不足取了。袁宏道对于文学创作的正面主张，见于他为袁小修诗集所写的序，他说小修：

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而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余则极喜其疵处；而

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袁中郎文钞》）

这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就是指作家要写自己真实的感受，并且说诗道进是由于有丰富的生活体验的结果。他更特别强调那些具有本色独造的诗，而不喜欢看看似好而实际上是模仿造作的作品。

公安派这种反对摹拟剿袭，提倡写真情的主张，在曹雪芹那里得到了共鸣：

……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第一回）

……这些书就是一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这么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他何尝知道那世宦读书人家儿的道理！别说那书上那些大家子，如今眼下拿着咱们这中等人家说起，也没那样的事。（第五十四回）

曹雪芹在这两段文字里对于才子佳人作品所表示的强烈的不满，在全书涉及创作问题的同类情节中（如四十八回写香菱学诗），是很不平常的。这表明在曹雪芹从事《红楼梦》创作时，当时文坛上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换言之，摹拟剿袭的风气不仅存在于正统文学中，也沾染到一部分从民间兴起的小说和戏曲中。这在清初，尤其是这样。本来商业的繁盛，导致市民阶层的兴起，从而促使民间文学进一步的发达。明代万历以后，话本、拟话本的大量流行和戏曲的繁盛，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可是这些作品中一部分开始丧

失了最早的新鲜活泼的生命力，而趋向于模仿因袭。这些作品无疑的受到时间的淘汰，而没有留存下来。曹雪芹两次在小说里，大批“才子佳人”，大破“陈腐旧套”，说明这一类作品当时确实曾经充斥泛滥于读者当中。

曹雪芹在这里强调他的小说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他所强调的也就是题材的真实性。这和袁宏道“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叙竹林集》）的主张也完全相同。可是为什么曹雪芹能够以他光辉的作品来证明他的创作理论的正确，而袁宏道和他的公安一派虽有鲜明的主张，但却并没有产生很多有着巨大文学价值的作品呢？这里差异不是产生于理论上，而是存在于创作的理论和实践是否得到统一。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对于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的。可是尽管它力求文学创作根源于生活，但并没有产生出多少可以称得上为“令人夺魂”的作品。以后竟陵派继起，企图矫正公安派的轻率，但也未有显著的成绩。这就是说，不同于曹雪芹，公安派在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是存在着矛盾了。

袁宗道（小修）以为文学凋蔽的病源不在于模拟，而在于“无识”，他说：“若使胸中的有所见，苞塞于中，将墨不暇研，笔不暇挥，兔起鹘落，犹恐或逸，况有闲力暇晷引用古人词句耶？”（《论文》下）袁宗道在这里显然认为丰富的生活体验是决定作品好坏的最主要的因素。代表公安派的这个主要见解，可以解释为是企图对于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和生命。公安派的文学运动终于没有能够取得与它的鲜明旗帜相称的成绩，这意味着中国正统文学本身是处于重大变革的前夕了。

这样我们可以说《红楼梦》所提出的反“陈腐旧套”和反才子佳人作品，虽然是处于公安派文学运动的余波之内，但由于时代已经进入十八世纪，因此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对于公安派，反对摹拟剿袭多少意味着矫正文风，这只要看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里

对于复古思潮所抱持的较为温和的语气就可以知道了。但是对于曹雪芹，这就是在一个崭新的文学形式里怎样清除旧的传统的影响的问题。因此从文学发展来看，这是对于传统的分裂。公安派没有能够让他们的创作理想在实践中取得贯彻；而《红楼梦》却以它鲜明的主题和无比丰富的生活内容，取得了创作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的统一。这说明中国文学的传统确实是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红楼梦》的诞生正是这一变革的重要标志。

二、清初的反理学和《红楼梦》的反封建主题

从南宋开始，理学在中国保持了好几个世纪的统治。一直到明代后期，在政治和社会的危机加剧中，理学才全面地暴露了它的极端腐朽反动的本质。对于理学统治的不满，在许多领域里都有所增长。但是只是到了明亡以后，在清初发端的一次思想运动中，理学才受到了最猛烈的攻击。这一思想运动，对于后来《红楼梦》反封建主题的形成，毫无疑问是有着渊源关系的。明王朝的覆灭，使一些有民族思想的士大夫、学者和思想家开始认真检讨造成民族沦丧的根本原因。他们很自然地得出了空谈导致误国的结论。而空谈的责任就在理学家身上。重实务，反对空谈性命之学的颜元就是抱持这种见解的思想家。顾炎武也谴责理学家聚徒讲学“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在他们看来，王阳明一派就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代表人物。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具有唯物思想的学者和思想家，如陈确、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颜元、戴震等都是这三百年来思想界中最卓越的人物。重实践是他们共同的特点，而这是使他们的学说和言论具有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因素的根本原因。虽然这一思想运动后来转入了另外的轨道（训诂考证），但是由于它最初具有勇往直前的气概，因此它的思想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这说明运动不是凭藉少数先知先觉的思想家的发难，而是反映了时代和历史所发生的变化。

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它一开始就是和政治紧密结合的。对于历史，它起的是阻碍进步的作用。因此它是一种保守力量的代表。近代学者蔡元培一面承认宋代理学“研究之勤，著述之富，徒党之众”，“为自昔儒者所不及”，一面又尖锐地指出：

而其为说也，矫恶过于乐善，方外过于直内，独断过于怀疑，拘名义过于得实理，尊秩序过于求均衡，尚保守过于求革新，现在之和平过于未来之希望。（《中国伦理学史》第九章）

所以理学在它运用于政治和现实生活时，就是保守的、维护现秩序的，任何变革和对于未来的设想都是和它的精神不相容的。

封建中国的礼教，经过宋代理学家从理论上强化之后，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严厉和周密。禁锢女性身心的贞节观念，也是在理学家的“天理人欲”学说的推演下形成和确立的。程颐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自明矣。”朱熹把“天理”和“人欲”看作同时存在的两个对立物。王阳明主张“良知”，认为“良知”是天赋的，“良知”欠缺是由于受到了“欲”的“蔽”。不论是朱熹或者王阳明，他们都否认物质第一性的原则，认为“欲”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天理”。我们都熟悉的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就是根据天理人欲的理论产生的：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娶），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曰：“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妇人丧夫不仅不能再嫁，男人娶了再嫁的妇人，男人自身也变成失节，这样就使妇人根本失去再嫁的机会。对于封建统治起着维护作用的这种伦理观，使无数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妇女失去了幸福，甚至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在钟鸣鼎食、富贵之乡的《红楼梦》的贾府里，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完整的守节女性的典型——李纨。所不同的，她不至饿死，不过却必须表现为“槁木死灰一样”。

围绕着天理人欲的问题，王夫之是第一个从理论上给予猛烈反击的伟大的思想家。虽然这种攻击近似于哲学上的论辩，——因为他们的目的也是要从这里来解除理学家的武装——但是在这场思想运动中，从理论上摧毁天理人欲学说，应当说是它最有积极意义的成就。因为有了一批思想家先从理论上批驳，然后人们才能够不仅从理论上得到认识，而且还能够诉之于情感来控诉理学的罪恶。

王夫之首先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正蒙注》）。这一命题后来又被戴震做了更加彻底的发挥。（参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六节）戴震引述《礼记》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句话，作为辩驳的主要根据。这不仅因为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是属于正统范围的，而且也因为理学有着牢固的统治地位，没有依傍是不能够跟他抗争的。戴震认为“欲”是客观存在的，“理”只不过是行为的准则，它并不是“欲”的对立物。行为有正有不正，但不存在另外一个独立的“理。”所以在他看来，理学家的“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的论证是不能成立的。戴震看出了理学家这种论证体现为具体的伦理观念并且用之于统治社会时，它所造成的危害就太大了。他把理学对于社会产生的祸害归纳为三点：

第一，理学是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害的，因此人民所受的痛苦是没有止境的。他说：“言之深入人心者，其祸于人也大，而莫能觉也；苟莫之能觉也，吾不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孟子字义疏证》）宋以后的理学不仅高踞于儒教正统的宝座上，而且几乎取孔子地位而代之，这就造成一种深入人心的局面，使人民受麻痹，受欺骗，不知道或者不敢知道自己是礼教的受害者。在《红楼梦》里，我们看到有反抗，但是也看到有更多的默默的受害者，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理学的统治是最残酷的。他说：“今既截然分理、欲为二，治己以不出于欲为理，治人亦必以不出于欲为理，举凡民之饥

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轻其所轻，乃曰‘吾重天理也，公义也，’言虽美，而用之治人则祸其人。”

（《孟子正义疏证》）

第三，理学是造成整个社会上下虚伪欺诈的根源。他说：“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孟子正义疏证》卷下）

残酷，虚伪，杀人于不觉之中，这就是戴氏对于理学罪恶所做的总结。作为思想家的戴震，他对于理欲说的辩驳，有时几乎是带着愤慨的情绪，这里就是他著作中有名的篇章，为许多思想史所征引过：

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闡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道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天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一个思想家对于理学罪恶做出这样的控诉，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最沉痛的地步。但是所有的思想家，包括王夫之和戴震都没有例外地只是从这一理论的最广泛意义上来阐释，而且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保卫儒教正统（它的代表人物是孔、孟）。这里造成理学支配整个社会的社会因素是被缩小或者歪曲了，而理学统治的最大的受害者——封建中国的女性是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就是说历史的局限性，使思想家在反对自己时代的反动思潮时，思想家自己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旧思潮的影响和束缚。这特别是

反映在对待女性解放这个最敏感问题上。

《红楼梦》是在这样一个思想背景下产生的。

作为《红楼梦》中心人物的贾宝玉，在他身上体现着两个主题倾向。一个是他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个是他和周围环境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焦点是他和贾政的冲突。贾政在《红楼梦》是一个具有最独特地位的人物。作者一开始就把他说成是“谦恭厚道”“非膏粱轻薄之徒”。换言之，这是一个以正面姿态出现的反面人物。为此，作者把他塑造成一个具备了所有僵化了的伪道学和封建礼教性格特征的典型。这样我们就看到在整个《红楼梦》通过艺术形象所再现的反理学反封建礼教压迫的场景，贾宝玉和贾政总是站在两个对立的面上。如果思想家只能从哲理上来反理学，那么《红楼梦》是真正做到诉之于情了。反理学的思想家只能慨叹“死于理，其谁怜之！”《红楼梦》却不仅展示了那卑者、幼者、贱者受“理”的压迫和摧残的情景，而且它唤起了人们内心的激情，使读者和人物一样把他们的内心燃烧起来了！

明代万历中叶出现的公安派的文学运动，虽然是文学领域里的一次反复古主义统治的斗争，但是它也是整个要求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的反映。这时同样产生了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思想家。李卓吾就是其中最卓越的一个。公安派的领袖三袁兄弟都受到李卓吾思想的影响。到明末，受公安派影响的作家如张岱、王思任、刘侗，以及后来清初的作家如李渔、郑板桥等人，他们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要求个性解放和对女性采取比较同情的态度。稍后于曹雪芹的袁枚，他的文学思想是跟公安派有渊源关系的，而且他对于女性的看法也是比较开明并且和正统观点不完全相同的。出生于曹雪芹之后的沈三白，他的《浮生六记》，其中尊重女性，重闺情，反对礼教的思想，在中国正统文学中也是极不多见的。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在曹雪芹之前和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里，新的时代潮流正在形成，它是反理学思想运动的延续和扩大。

当中国进入十九世纪的时候，清初思想运动所没有完成的任务，就在更大和更深的范围内开展了。这时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是龚自珍和魏源。这是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带来更大震动的运动，古老封建中国的基础开始受到了空前猛烈的冲击。戴震死于一七七七年（比曹雪芹晚十四年），在一七六三年出生的俞正燮，是一个进入十九世纪前期的思想家。戴震在他反理学的哲学体系中，所没有能接触到的妇女问题，俞正燮却以最大的同情为受压迫的女性进行辩护（他的著作：《妒非妇人恶德论》《节妇说》《贞女说》等），他的大胆有力的论点是过去任何一个思想家所望尘莫及的。这说明历史是以更大的步伐前进了。当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开始形成，社会进入变革前夕的时候，思想家，无疑的是最先唤起人们觉醒的人。和思想家相比，诗人和小说家却把对于未来的憧憬变成了可以感觉到的真实图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和小说家又可以说是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了。曹雪芹也正是这样。传统和当代的思潮哺育了他，但他那深入生活的经历，使他的心灵没有受到限制。所以不是思想家的微文，而是曹雪芹笔下所展现的这一幕幕的生活场景才具有最激动人心的力量。

三、明、清的八股文和《红楼梦》主题中的反八股

《红楼梦》情节中直接和间接提到八股文的虽然不过六七处，但是作者对于八股文所表现的强烈的反应，却一直贯彻在整个作品的反封建主题中。八股文作为科举制度所采用的文体，是在明代发展并最后得到定型的。从明至清，八股文在中国的统治长达五百多年。它对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能单单从时间上来计算的。同时，八股文风行的时候，也正是理学在中国统治最牢固的时代。事实上是，被宋明理学所强化了了的封建礼教和科举制度下的八股文，这两者构成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最有力的支柱。并且可以这样说，理学对于思想的箝制和对于封建宗